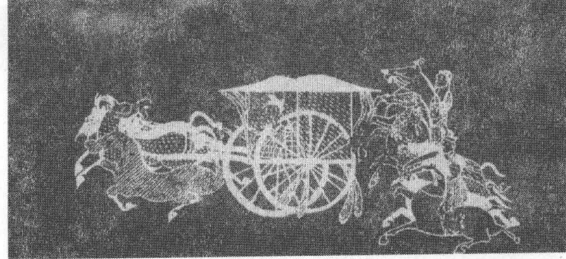




高句丽

移民研究

◎ 苗 威 /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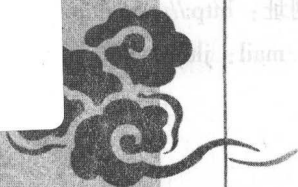
◎ 苗威 / 著

高 勾 丽

移民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句丽移民研究 / 苗威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601-7572-0

I. ①高… II. ①苗… III. ①高句丽(前 37-668)-移民-研究 IV. ①K31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5312 号

高句丽移民研究

苗 威 /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张树臣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0.87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5601-7572-0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省金山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2011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 序 ·

随着 1998 年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 200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的立项，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历史的研究终于打破了多少年的沉寂，进入了一个涨潮期。一时之间，关注高句丽史的，不仅有耄耋之年的前辈学者，也有初出校门的史学新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位处东北边疆的延边大学数次联合主办了高句丽学术研讨会，我大多参加了。大约是在 2003 年的“高句丽与渤海学术研讨会”上，初识苗威博士。当年她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兴趣之高、研究视角之独特，给我印象颇深。其后数年之间，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国内高句丽史研究冷热不定，热心于高句丽研究的同道多转攻他史，少有“痴迷不悟”者，苗威博士是其中之一。今闻苗威新作《高句丽移民研究》即将出版，不禁振奋：在料峭萧条之中尤有新绿唤春，可鉴高句丽的魅力！能够在出版之前先睹为快实为幸事，而尽管自感学识和资历尚没有达到为人作序的程度，但无论是作为高句丽历史的研究者，还是出于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不断深入的内心愿望，都觉得有义务向学界推荐该书。这也是无法拒绝作者而写下这些文字权作“序”的缘故。

高句丽政权虽然“介在中国东北隅”（《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语）长达 7 个世纪之久，但中国学界真正的高句丽历史研究则是始于 1877 年《好太王碑》的发现，至今也不过百年有余。百年的高句丽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1877 年至 1949 年可以视为开创期，以《好太王碑》的发现为开端；1949 年至 1980 年为积累期，成果则是以高句丽考古的发现和研 究为主要特征；1981 年以后为发展期，高句丽历史研究全面展开，并在 2001 年之后一度形成高潮。纵观高句丽研究的百年历程，已经涌现出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仅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千余篇之多，相关著作也有近百部。这些论著或从高句丽政权和民族的兴衰角度，或从高句丽文化（包括考古文化）、文献等视角来阐述高句丽历史，已经涉及到了高句丽

历史的诸多方面，可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数量的大幅增加，学术质量的提高，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学界的高句丽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不能否认，我们的高句丽研究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研究成果的出版与发表、研究队伍的培养等，同时，相同视角的重复研究也困扼了学术的创新与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新的切入点以推动高句丽研究的深入就显得十分迫切了，《高句丽移民研究》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应该说，移民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高句丽政权的出现本身就是移民的结果。史载，夫余王子朱蒙“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魏书·高句丽传》）而且，高句丽移民的历史比高句丽政权的历史要长一些，因为高句丽政权灭亡之后高句丽人口的移动还依然存在着。《高句丽移民》以流动的人口为切入点对高句丽历史进行解读，不仅弥补了以往高句丽历史研究的不足，也为研究的深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高句丽移民研究》探讨的重点是高句丽“外移”之民的基本情况。高句丽政权存续期间，在东亚错综复杂的局势下，能够从弱至强，再转向衰亡，期间不仅政权经风历雨，运畴于浑江流域，发展于大同江流域，波及于汉江流域，同时，高句丽民亦在“居”与“移”之间变幻着心路历程。而这种历程则深层反映了高句丽政权和民族的盛衰之迹。梳理高句丽移民的历史，不仅对我们认识高句丽政权史是一个补充，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而明确公元前后至公元7世纪的东亚格局。

综合来看，《高句丽移民研究》的主要特点大致有四：

一是资料收集全面，解读亦较为精准。从文献记载，到碑碣铭文，作者梳篦细致，详核考订，以往含混的问题得到再认识。如关于“回葬”是否是高句丽人的习俗问题，关系到今天对高句丽一些历史问题尤其是一些大型墓葬主人的认定。以往有学者认为在高句丽中期“回葬”之俗已经形成，《高句丽移民研究》则认为在高句丽政权灭亡之前高句丽民族不存在“回葬”之俗，进而明确指出高句丽移民中的“回葬”是受染于中原地区的汉人。（参见《高句丽移民研究》第九章）这一结论因为利用了大量的墓志等考古资料，辅以文献考证，可能更接近史实。又如关于高句丽民族的自我意识问题，也是一个中外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些韩国学者认为在高句丽政

权灭亡之后高句丽移民“长期保持着作为高句丽人的正统性”（参见《高句丽移民研究》绪论之“研究综述”），这种认识很显然掺杂了研究者的个人意识。《高句丽移民研究》则利用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从高句丽移民是否自愿选择“自身的趋向”和分散到各地的高句丽遗民具有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我们对高句丽政权的属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二是论述细致，既有宏观探索，也有微观考察。《高句丽移民研究》对高句丽移民阐述，一方面以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几次大的移民潮为线，系统阐述了高句丽移民的发展历程和不同王朝和政权对高句丽移民的安置政策，这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高句丽移民的整体情况，也弥补了以往研究多关注历代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政策，忽略诸如战俘之类高句丽移民措置等方面研究的不足。同时，又以移民个案为点，对具体的移民情况进行详细考证，给读者提供了很多典型的移民案例。如第四章对南北朝时期高琳等家族迁入中原史实的考述，内容涉及到了高琳家世、高琳在中原王朝的任职经历；高肇家世、高肇五世祖高顾的族属、高肇兄弟的自我意识；文昭皇后史事考；宣武皇后高英；茹皓之妻与安定王妃等，同时也有对移居新罗的高句丽僧人情况的阐述。第六章对高句丽王族和泉氏家族等移居中原地区的情况进行考述，内容不仅涉及到了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考、泉献诚及其后代在唐史事考，而且在这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内地接受的待遇、自我认知的变化等做了深入分析。这些针对高句丽移民的具体个案的阐述，是立足于作者搜罗的大量资料尤其是墓志等考古资料基础之上的，因而作者的一些见解很容易被接受。如作者认为：“泉恚（公元706—729年）的墓志是由其父泉玄隐亲自撰写的，对于其籍贯直接记载为‘京兆万年人’，表明至第二代移民玄隐时对于自己高句丽人的印象已经非常淡漠。至第三代移民泉恚时代，则不再提起自己与高句丽的关系，对于籍贯，与其父一样，表明是亦是京兆万年人，而对于曾祖泉男生、祖父泉献诚、父亲泉玄隐皆称其在唐为官的官职，并未涉及到其家族在高句丽的辉煌。在姻亲叙述中，提到‘开府仪同三司、朝鲜王高藏之外孙’，这里对高藏亦未以‘高句丽国王’称之，而是以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朝封予高藏的头衔称之，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高句丽的自我属性意识。说明经历四代人在唐生活，三代移民的事实，到泉恚这一代时已经完全融入汉族之中。”（《高句丽移民研究》第六章第四节）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有助于我们了解高句丽移民进入中原地区之后融入当地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情况。

三是对高句丽遗民的流向问题做了数据分析,不仅使作者的立论更加精确,而且也更有利于读者准确了解高句丽和周边民族的渊源关系。关于高句丽政权灭亡后高句丽人的流向,《旧唐书·高丽传》载“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也记载“贫者留安东城傍,旧城往往没于新罗,余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高氏君长遂绝。”这也成为了学界解读高句丽政权和周边政权或民族渊源关系的主要线索。但是,要搞清楚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人的流向,还需要对高句丽政权的人口做详细探讨。杨保隆先生在《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有过阐述,他认同《新唐书·高丽传》记载的“户六十九万”,而非《旧唐书·高丽传》记载的“户六十九万七千”,同时认为“此为高句丽国境内的总户数,包括了许多非高句丽族户”,进而赞同“15万户”的说法。(《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对此,《高句丽移民研究》也专门设有一章论及“高句丽灭亡后的人口流向”(第八章),不过却得出迁入唐朝内地的高句丽人约有155万2千7百人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和以往的观点有很大出入,但却是在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由此看来关于高句丽人口的数量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四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东亚民族融合的图画。以往我们的视角过多地集中于阐述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论及民族之间或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多是局限于相互之间的政策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已有的几部高句丽史著作多是如此。这样固然可以反映一个民族以及民族或政权之间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但落实到具体阐述往往给人一种宽泛和空洞的感觉。《高句丽移民研究》对高句丽移民的研究尽管也有宏观上的阐述,但更多的则是对藏身高句丽政权和历代王朝或周边政权密切关系大背景之下的高句丽移民个体最终结局的具体阐述。通过作者的这些阐述,如对泉氏后代(第七章)及移民后裔如高仙芝等(第八章)在唐朝史事的考述,我们可以具体而形象地了解到古代东亚民族之间的融合情况,因为移民史所反映的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

希望《高句丽移民研究》的出版对与我国高句丽历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李大龙

2010年5月1日于北京三环新城寓所

——绪论——

高句丽（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的移民运动在其政权建立不久就已经存在，而当高句丽政权在历经705年走完它的历程之后，其遗民的移动却仍未停止。可以说，高句丽移民的历史比高句丽政权的历史更为持久且复杂。每个时期的每一次移民都有特定时代的影响因素，当然每次移民运动都有不同以往的个性因素。系统梳理高句丽的移民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东亚古代史，尤其是明确古代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句丽移民”的选题缘起

选择“高句丽移民研究”这一课题，主要出自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从大学毕业起，我在延边大学历史系任教职，因地缘关系，我们的许多课程与东亚的历史，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历史有关。本世纪初，我开始从事有关东亚汉文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其中主要的研读对象是中国正史中的《高句丽传》，以及高丽时代金富轼所著之《三国史记》、一然所著之《三国遗事》等，对汉唐之际地处“中国东北隅”^①的高句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也是中韩学界高句丽研究互动频繁的时期，国内外学者有关高句丽的研究较为活跃，成果颇多。据统计，仅2000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高句丽的学术文章就有近80篇。^②身逢当时，我不仅从这个学术热潮中汲取了丰厚的学养，亦为自己确定了主要的研究方向。这是我以高句丽史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其二，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勃兴于两汉时期，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一度取代了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并最终成为中国史体之“正”，

^① 语出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2《高句丽本纪·宝藏王下》之“论曰”。孙文范等校勘本，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作者说明：本书所引《三国史记》之史料参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但句读有所不同。

^② 耿铁华主编：《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1页。

至清朝乾隆年间，择取自《史记》至《明史》之历朝纪传体史书总为“二十四史”。这种史体的长历不衰，表明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所具有的无穷魅力。在高句丽史的研读中，我也在寻找以个体或群体的人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

在高句丽政权存在的七个世纪中，东亚的局势发生了沧海桑田的重大变化：中原王朝从两汉时期的“和”，至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分”，再到隋唐的“和”，逐步走向古代世界的顶峰。而朝鲜半岛的变化也毫不逊色，仅大同江中心流域的朝鲜半岛北部，就经历了乐浪等四郡的郡县时代、高句丽政权割据时代，并进入到安东都护府羁縻时代。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在此期间经历了草创至强盛的嬗变；与新罗毗邻的百济则兴而复亡。位于日本列岛的倭因为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所以发展平稳，然而，一旦寻找到机会，就会染指于朝鲜半岛。可以说，这七个世纪是东亚诸国家和民族充分碰撞与交流的时期。交流自然少不了“人”的主导作用。彼时，高句丽因处于中原王朝与百济、新罗陆上通道的当关之地，所以，高句丽既是当时东亚政治势力兴衰的风向标，同时也是人员流动的中转站。尤其是高句丽在受到中原王朝或新罗的军事打击之后，迁往中原和周边民族与政权的人口更是络绎不绝。围绕这些迁出时期不同，迁入地点各异的高句丽人的历史演绎，不仅对于东亚民族的发展与融合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彼时的政治格局走势、各自政权史的发展也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高句丽动态的“人”的历史。

其三，我在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师从武玉环先生做博士后课题研究，研究方向是东北民族史。武先生本身对东北民族的移民问题颇为关注，对渤海、辽金移民皆有专题研究。针对高句丽移民问题迄今鲜有系统研究的情况，建议我考虑完成这一课题。这一视角的撷取令我颇感兴趣：首先，高句丽的相关文献史料我较为熟稔，碑碣铭文亦是我正在着手研读的；其次，针对高句丽移民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学术空间，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再次，我曾经欲以“人”带动相关研究的设想可以借助此课题得以实现。另外，我对与高句丽历史地缘关系密切的古朝鲜、汉四郡等历史问题皆有专题研究，^①相关的历史脉络比较清晰。综合上述情况，虽然知道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个选题难度很大，仍然确定围绕高句丽移民问题，展开我的博士后报告研究工作。

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即是我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

^① 笔者曾先后完成《乐浪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古朝鲜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

二、“高句丽移民”的研究对象

“移民”二字相连属，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屡有出现，大致有如下二种情形：一是动宾词组，指“迁移人口”，尚不是专有名词。《周礼·地官·司徒》云：“则令邦国移民通财”；《管子·七法》亦谓：“欧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二是虽然“移民”连属出现，但并不是一个词，如《大戴礼记·千乘第六十八》即有“太古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各安其居，乐其宫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这里的“地移”和“民在”分别是二个并列关系的主谓词组，“移”指转换，“民”指百姓。可见，“移民”的具体意思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移”、“民”无论是单独解释，还是连在一起解释，皆与“移动”和“人口”有关，基本所指皆是人口与原居住地之间的分离。

当代对于“移民”的解释有较多版本。比如，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指出：“一般来说，移民是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任何参加了这一迁移过程的人都是这次移民中的一员，都具有移民的身份。但作为研究的对象或一种社会现象，移民一般都是指人口，即一群人或一个群体。因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例子外，即使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迁移，也可以归纳为某一类型的移民。”^①台湾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解释为：“移民是人口动态的一种。‘普通限于涉及有较长居住变更的人口迁徙’，并非指任何一种的人口移动。如甲地人口移往乙地从事较长期的居留，这才叫移民。从甲地的立场，这是人口外移；从乙地的立场，这叫人口内移。就其迁徙所及的区域看，国与国间的人口迁徙名为国际移民；一国内部的人口迁徙名为国内移民，又可分为区域移民和农村都市移民。”^②

本课题主要研究高句丽政权建立后其领域内的居民向外迁移的历史。从富尔江流域土著居民高夷的角度而言，高句丽政权的建立者亦是“移民”，其开国君主朱蒙从夫余率众“东南走”，来至纥升骨城，始定居建国。^③朱蒙所建之高句丽政权中的百姓对于迁徙是并不陌生也并不抗拒的，随着势力范围的渐扩渐大、高句丽政权内部形势的愈来愈复杂以及东亚局势的风云变幻，高句丽域内的居民向外移动的现象频有出现。文献对于高句丽群体或个案的移民虽有所记载，但欲通过有限的记载而深入研究高句丽移民问题确实存在孔子的文献“不足征”之叹。所幸考古发掘亦为研究提供了

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② 王云五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5页。

③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14页。

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使研究的深入成为可能。

然而“高句丽移民”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笔者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限定。从时间上讲，高句丽移民研究以朱蒙于公元前37年在沸流水流域建立高句丽国为起点。事实上，高句丽作为一个概念，既是族称，亦是国称，学界普遍认为高句丽民族的产生早于高句丽政权，从高夷至“古高句丽”，直到朱蒙建国，其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本课题为了明确高句丽民族的基本情况，对这个复合民族中有关高句丽民族起源与融合的情况进行了简短交待，而“移民”的上限则定于高句丽政权建立。高句丽政权于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为唐罗联军所灭，但人口的移动却并未因政权的终结而停止，反而因为高句丽政权的覆亡导致了本居于高句丽域内的居民更大规模的移动，而且这种移动在高句丽灭亡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断续进行着，比如，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因高句丽末代王高藏被派回辽东做辽东都督期间谋叛，导致了原高句丽领域内的百姓的再一次迁徙；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震国（即后来的渤海）时一大批高句丽人前去投奔。我们通常将高句丽灭亡之后的高句丽人称为“高句丽遗民”，而其遗民基本所指的是高句丽灭亡之前出生的人口。所以，“高句丽移民”的下限确定于高句丽灭亡后半世纪左右，即公元八世纪初。不过，为了明确高句丽移民对移入地产生的影响等情况，我们对有代表性的高句丽移民后裔也有所交待，但基本不超出第一代移民的第六代孙。从流动方向上看，是指从高句丽领域之内移往高句丽领域之外的人口。正如《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所云，移民有“外移”和“内移”之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句丽的“外移”之民。从民族成份上讲，本课题的“移民”，包括在高句丽领域内居住的所有民族，即高句丽族、汉族、沃沮、肃慎（挹娄）、鲜卑、靺鞨等，而不单纯指高句丽民族。

“高句丽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高句丽政权存续时期的居民以及高句丽灭亡之后的遗民，从高句丽领域之内向外迁移的背景因素、移民方向、到移民地点后的安置状况、移民中的代表人物史事疏理、由移民而引发的“血统论”等理论探讨、高句丽移民在中朝历史中的定位等问题。

当然，仅仅以高句丽“外移”人口为研究对象并不能完整地揭示高句丽移民的全貌，与高句丽移民有关的朝鲜族源、古代东亚各民族的融合情况也不能完整地体现出来。而且，由于受到资料不足等情况的限制，本课题的探讨对个别的移民数字以及高藏这类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生存区间尚不能得到精确结论，同时囿于能力，有些认识也不一定正确。另外，学界既有研究成果无疑使笔者颇受启发与惠泽，虽然有些认识与本研究相左，但笔者仍然从中收到许多有益的借鉴，真诚致谢！

三、“高句丽移民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以“高句丽移民”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本研究可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尽管《三国志》、两《唐书》等中国正史和《三国史记》等韩方文献皆对高句丽政权从始至终存在着的移民有所记载，而且其移民的流向、有代表性移民后裔的史事梳理等也得到了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但在历史学、边疆学等研究领域内，就目前笔者所见，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没有一部著作或专题论文将高句丽移民作为一种持续七百年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对此笔者在“研究现状”中将具体述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二是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促进高句丽历史的相关研究。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提出：“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人口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①我们也可以换言之：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高句丽史。

三是与移民所伴生的历史问题是立体而直观的，这对于我们准确解读高句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移民问题的探讨，可以明确造成移民的背景因素，并解析形成移民的各种“力”。事实上，移民的形成不外乎三方面的“力”，一是迁出地的“推力”，即“导致迁移的直接或间接原因”，^②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或战争、经济水平与周边地区的差异、气候与环境恶化的威胁等；二是迁入地的“拉力”，即“吸引移民迁入及导致移民最终定居的因素”；^③三是“外力”，即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外的“力”，主要是指出于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强制性移民。在了解每一次移民形成所受到的“力”的同时，也就了解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等诸多深层的关系。同时，迁入地对高句丽移民的受容，也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古代的民族融合。兼之高句丽政权早期的移民是与开疆拓土相联结的，因而，高句丽移民问题的明确无疑会将高句丽的政权、民族、疆域、民俗诸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

四是由于高句丽跨越了现今中朝国界，有关于高句丽的历史问题在学界一度成为歧议较多的话题，高句丽政权存续期间，不只与中原诸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以及倭皆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不同流向的移民也是始终存在的，“高句丽移民”移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无疑融入了人居地，其后裔亦

①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75页。

②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26页。

③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31页。

成为移入地的一员。通过对高句丽域内居民在不同时期的流向以及人口流量等问题的解读,对于明确高句丽在中朝历史中的地位无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总之,将高句丽移民问题作为历史现象进行专题研究,不仅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围绕高句丽历史问题所存在的中朝韩学界的歧议认识较多,尤其是在“归属”等问题上的纷歧:中国学界普遍认为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而朝鲜、韩国则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是韩国历史之一部分。随着学术之外因素的渗入,高句丽历史问题也因而被人为地变得“敏感”起来。事实上,高句丽历史存在它的特殊性,但远没有目前所展现的那么复杂。我们在研究高句丽移民时,要将其放在彼时东亚的时空之下,从疆域和民族的角度皆会得到有益的启发,进而得出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本课题的研究以文献史料和碑碣铭文为主要依据,从史料出发,注重考证和辨析。整体来说,本课题的创新点有五:一是,至目前为止,本课题是学界可见首次针对高句丽政权内(包括灭亡后的“遗民”时代)“外移”之民的专项研究,本研究按时代顺序为大编年,分成3至4世纪、5至6世纪末、6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等几个阶段对高句丽政权存续期间的移民进行系统梳理,这种架构便于史实的清晰陈述,完整地反映了高句丽的移民史。二是,不仅系统地检索文献史料,同时也仔细研读相关的碑碣铭文,使文献“不足征”的高句丽移民资料得到更为丰富的信息补充。三是,对已经引起学界关注的史事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对于高句丽灭亡之后69万户人口的流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这个人口数字统计的时间,然后以此为上限开始对69万户的移驻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得出相对合理的统计数字等。四是,对学界尚未引起重视的问题提出一己之见,比如,由泉男生及其后人的移民所引发的深层思考、高肇等高句丽后裔的民族属性等。五是,对由移民而引发的“血统论”等理论问题进行再思考,通过对高句丽灭亡之前不存在“回葬”之俗的分析进而明确高句丽移民中的“回葬”是受染于中原地区的汉人。此外,通过综合分析,对相关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

四、“高句丽移民”的研究综述

高句丽政权因跨越今天中朝边界,故而中国、朝鲜、韩国学界皆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近代以来对于高句丽历史的关注始于19世纪80年代好太王碑的发现,在百余年的研究历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北边

疆民族历史研究深化发展的背景下,高句丽历史研究进入了“勃发期”。^①不仅中韩学界关于高句丽问题互动频繁,而且有关高句丽历史的研究亦较为活跃,成果颇多,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至2008年十二年间,国内公开发表的高句丽专题学术论文近700篇,学术专著数十种。研究层面宽泛。而学术界针对高句丽移民所做的研究,据目前的检索情况,主要是相关文章,在一些著作中也有部分章节有所涉及。但是,迄今为止,关于高句丽移民成体系的研究专著尚未出现。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 关于高句丽移民个案的研究。也就是针对高句丽移民中的个人,或某一家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杜文玉以在洛阳一带出土的《泉男生墓志》等的墓志资料,辅以文献记载,对移民于唐朝的泉氏家族四代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泉氏家族虽然来自高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已经逐渐与唐人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②马一虹亦主要通过高震等人的墓志记载,分析了他们在“归属意识(自我身份认同)”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认为:“入唐高句丽遗民的认同意识,实际上同时也涉及到了唐朝政府及时人对于这些所谓外来降蕃的接受与认同,即说到底是个双向认同的问题。”^③拜根兴通过对高足酉墓志的考释,对其移民时间和移民事迹进行了探讨。^④阎海的《高欢族源探微》^⑤对高句丽移民后裔高欢的民族属性进行研究。连勋名的《唐代高丽泉氏墓志史事考述》^⑥也是对泉氏家族的专题研究。高之谦与高兴《识读唐高震墓志铭后的联想》^⑦认为高震墓志反映了唐代政治生活中宽松的环境。

2. 在高句丽移民群体中找到共性的视角进行研究。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⑧《唐代蕃将研究续编》,^⑨马驰的《唐代蕃将研究》,^⑩这三部著作的着眼点相同,皆是以在唐的少数民族将领为研究对象,其中亦有来自于高句丽的将领及其后裔,以蕃将群体的形式进行研究叙述。姜清波以《入唐三韩人研究》为题所写作的博士学位论

① 马大正:《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杜文玉:《高句丽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马一虹:《从唐墓志看入唐高句丽遗民归属意识的变化》,《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④ 拜根兴:《高足酉墓志考释》,《碑林集刊》总第9辑,2003年。

⑤ 阎海:《高欢族源探微》,《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连勋名:《唐代高丽泉氏墓志史事考述》,《文献》1999年第3期。

⑦ 高之谦、高兴:《识读唐高震墓志铭后的联想》,《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6月。

⑧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湾联经出版社公司1988年版。

⑨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续编》,台湾联经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⑩ 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文^①对在唐高句丽人从王族、权臣等群体进行了分别探讨。

3. 以断代的形式,以迁入地为切入点,对高句丽移民进行研究。黄兆宏的《隋唐时期高丽人入迁河西问题考述》^②认为有近30万高句丽人随着隋唐政权对高丽的征伐战争被迁入中原,“主要分布在今北京、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这些移民有的从军,如高仙芝等;有的“善相人”,如金梁凤。刘春英、姜维东的《唐王朝对内迁高句丽人的安置措施》^③认为唐丽战争中俘获的高句丽士兵和普通民众被“有计划地分批将部分高句丽人迁入内地”,并安置在“河南、陇右诸州”。吴松弟的《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④和《唐五代时期朝鲜半岛对中国的移民》^⑤以及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之吴松弟负责的第三卷中,皆对高句丽移民的情况有所论述。张春海的《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⑥和《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各族与文化问题》^⑦对营州、幽州地区高句丽武人集团的形成、南迁及消亡进行探讨。

4. 对高句丽灭亡后人口情况的研究。这类成果较多。杨保隆在《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第一编“民族篇”第四节“高句丽国灭亡和高句丽人的去向”中,对高句丽遗民的去向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叙述和分析,“15万户约合七八万高句丽人的流向,迁居中原各地的近30万,投入新罗的约10万,亡入靺鞨(渤海)的10万以上,散奔突厥的万余人,凡50余万。余下的20余万人,再扣除散居今辽东半岛、平壤及其以北地区的‘遗人’和战争死亡的人数,上述分流人数与高句丽原总数,基本一致。因为仅就高句丽人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说,现能统计出的就有10余万。如《三国志》载,唐征高丽,高句丽人在建安之战中死数千,辽东城死1万多,安市之战死3万余,守鸭绿江兵死3万,金山一带死5万余人,薛贺水败死3万人(《旧唐书·高宗纪下》中作‘斩首五千余级’)。仅上所列已达10万余人,如加上高句丽人在与新罗军交战中死亡人数,总数就更多了。”^⑧孙进已在《东北民族源流》^⑨第五章《秽貊诸族的源流》第四节“高句丽民族的源流”中论及“高句丽民族的流向问题”,认为

① 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 黄兆宏:《隋唐时期高丽人入迁河西问题考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③ 刘春英、姜维东:《唐王朝对内迁高句丽人的安置措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又载于姜维东、刘矩:《东北地方民族史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吴松弟:《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

⑥ 张春海:《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⑦ 张春海:《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⑧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

⑨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高句丽的主流是今汉族”，“高句丽亡国时的六十九万户并不都是高句丽族人，而有不少是为高句丽统治的其他各族人”，因此主张“在讨论高句丽民族的流向时，不应把这些未融入高句丽的各族人计算在内”，因而“高句丽民族的人口要比六十九万户少得多。”高句丽灭亡后其人口流向有四。一是中原，尤其是高宗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内徙于中原的几万人“应是高句丽民族的核心主干部分”，所有迁居中原各地的高句丽人，“以后都加入汉族”；二是突厥，其“为数不多，不占主要地位”；三是渤海，其比例相当大，高氏乃“渤海右姓之一”，而渤海灭亡后，“融入渤海的高句丽人，被辽、金西迁，先到东蒙辽东，后到山东，最后大都融入汉族”，因此，高句丽四个流向中，“加入汉族的居其二，汉族成为高句丽的主流”；四是新罗，其中包括住在大同江流域的高句丽人，他们“大都融入到新罗族中，成为今天朝鲜族的一部分，因此朝鲜族是高句丽人的第二个重要流向。”不过，他强调说：“过去认为高句丽的后裔都是朝鲜族的说法却是错误的，高句丽人的后裔，不仅不都是今朝鲜族，而且今朝鲜族也不是高句丽人的主流。”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一）》、^①《中国高句丽史研究开放繁荣的六年》^②中对高句丽遗民的去向进行补充，认为“高句丽亡后不管是全部遗民，还是高句丽民族，都分归今中朝两国了”，“无论如何计算，归入中国的高句丽遗民和高句丽族人都是占多数”，“这些遗民都已融入今中朝各族，而且在今中朝各族总人口中都占少数。”对于上述见解，国内学者多持肯定意见，拜根兴认为这种见解“相当客观”，它“足以消除国内外学界在高句丽遗民最终去向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争执。”^③刘子敏认为高句丽“既是汉族或其他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半岛上的朝鲜族的来源之一。”^④孙进己与孙泓联名发表的《东北亚各国对高句丽土地、人民、文化的继承》^⑤中又叙述了高句丽人自曹魏至唐的流向，除坚持以往观点外，补充了日本流向。并将蒙古和俄罗斯亦列为“流向”之中。

杨军的《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⑥李德山《高句丽族人口去向考》、^⑦秦升阳的《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⑧宋福娟的《高句丽与北方民族的融合》、^⑨费驰的《对中韩

① 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② 孙进己：《中国高句丽史研究开放繁荣的六年》，（韩）《高句丽研究》总第16辑，2004年。

③ 拜根兴：《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1卷第2辑，2006年4月。

④ 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⑤ 孙进己、孙泓：《东北亚各国对高句丽土地、人民、文化的继承》，耿昇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杨军：《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东北史地》2006年第5期。

⑦ 李德山：《高句丽族人口去向考》，《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⑧ 秦升阳：《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⑨ 宋福娟：《高句丽与北方民族的融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学者关于高句丽遗民问题的比较研究——兼与韩国学者金玄淑商榷“高句丽遗民的自我意识”问题》^①等对于高句丽的人口尤其是遗民的情况亦有专题研究。

5. 对“小高句丽”的研究

所谓“小高句丽”，即指久居安东地区的高句丽残部所组成的部落群体。国内研究者不多，只有梁玉多著有《关于“小高句丽国”的几个问题》，^②认为“小高句丽国是存在的”，作者认为“在唐的属国名单中，有一个地处东方，称为高丽的国家”，“而其所提高句丽国史事的时间，均为高句丽灭亡之后至王建高丽建立之前，可知在这段时间确曾存在一个高丽国。”小高句丽国应是“高藏的后人受唐之命，以唐安东都督的身份去其地建立的。”而具体是高藏之子高德武所建，时间在公元699年或700年，亦即高德武以唐都督身份到安东之后不久。小高句丽建立于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德武建高丽国是一种越轨行为，所以唐尽管承认其属国地位，却没有给之以正式王的封号。”

（二）韩国学者的研究

韩国学者对高句丽移民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高句丽遗民的研究

李丙焄在《唐对高句丽部分遗民的抽户政策》^③中叙述了唐朝强制迁徙高句丽遗民的政策始末，并专门探讨了唐朝向这些遗民收取赋税的问题。卢泰敦撰文指出，高句丽灭亡后，其居民的去向可从六个方面把握：一是流向新罗，主要是公元668年新罗文武王掠回的7000口，渊净土及安舜投奔新罗所带户口等；二是投向渤海国，主要是指大祚荣建国后为追随他而北上者；三是移民倭国，这一移民集团人数有限；四是迁往唐朝内地，主要是公元668、公元669二次迁徙；五是仍然居住在辽东，即“小高句丽国”，六是投向突厥。^④徐炳国撰有《高句丽遗民的东突厥亡命》，^⑤考察了高句丽亡国前后的遗民与东突厥之间的关系，认为，高句丽遗民很有可能亡命于东突厥地区。高文简等向唐朝投降的背景很有可能与高句丽遗民无法在东突厥内进行独立活动有关。徐炳国著有《高句丽帝国史》，^⑥其中第六章第三节“活跃于北朝的高句

① 费驰：《对中韩学者关于高句丽遗民问题的比较研究——兼与韩国学者金玄淑商榷“高句丽遗民的自我意识”问题》，《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载刘厚生等主编《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远方出版社2000年2月版。

③ [韩]李丙焄：《唐对高句丽部分遗民的抽户政策》，《韩国古代史研究》，博英社1976年版；《震檀学报》总第25、26合集，1964年。

④ [韩]卢泰敦：《高句丽遗民史研究——以辽东、唐内地及突厥方面的集团为中心》，《韩佑勋博士停年退任纪念论文集》，1981年。

⑤ [韩]徐炳国：《高句丽遗民的东突厥亡命》，《关东史学》1，1982年。

⑥ [韩]徐炳国：《高句丽帝国史》，慧眼出版社1997年4月版。